



# 中国现代六大

● 刘锋杰著

# 批评家

安徽文艺出版社

# 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

刘锋杰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 AN HUI WEN YI CHU BAN SHE



口一之行·中身·这次一意旋的正学 笔情者意河学 和地;紧片见,然, 为表

**(皖)新登字 04 号**

**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

**刘锋杰 著**

**责任编辑:左克诚 封面设计:刘筱元**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巢湖地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875**

**插 页:2**

**字 数:250,000**

**版 次: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1289-4/I·1189**

**定 价:11.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序 .....                     | 何西来 |
| 导论 从中国近代批评到现代批评 .....       | 1   |
| 第一章 周作人——走向人的确立的艰难路途 .....  | 27  |
| 1. 五四文坛与周作人的“人”的观念 .....    | 27  |
| 2. 人的文学的具体界定 .....          | 36  |
| 3. 宽容的文学生长论 .....           | 47  |
| 4. 文学的无形功利说 .....           | 54  |
| 5. 从颠峰到低谷 .....             | 68  |
| 第二章 茅 盾——把人生镌刻在文学的旗帜上 ..... | 78  |
| 1. 人生派的代表人物 .....           | 78  |
| 2. 人生文学的内涵 .....            | 87  |
| 3. “客观性”的推崇 .....           | 104 |
| 4. 良好的态势 .....              | 119 |
| 第三章 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中国传人 .....    | 128 |
| 1. 接受古典主义 .....             | 128 |
| 2. 人性论的特征 .....             | 138 |
| 3. 以理制情的情理观 .....           | 148 |
| 4. 从道德说文学 .....             | 155 |
| 5. 冰冻的地带 .....              | 160 |
| 第四章 李健吾——畅游杰作的灵魂探险者 .....   | 176 |

|                               |     |
|-------------------------------|-----|
| 1. 以京派为依托 .....               | 176 |
| 2. 纯美文学的特征 .....              | 181 |
| 3. 印象鉴赏式的批评观 .....            | 197 |
| 4. 批评的宇馨儿 .....               | 209 |
| <b>第五章 胡风 以主体激活现实主义</b> ..... | 224 |
| 1. 拓展着的思维空间 .....             | 224 |
| 2. 以主体激活现实主义 .....            | 236 |
| 3. 现实主义的胜利 .....              | 255 |
| 4. 个性的毁灭 .....                | 265 |
| <b>第六章 周扬 政治文学的不倦阐释</b> ..... | 274 |
| 1. 从文学的政治化到文学的政策化 .....       | 274 |
| 2. 受动的艺术规律探寻 .....            | 290 |
| 3. 指导与误导 .....                | 313 |
| <b>余论 没有完成的建构</b> .....       | 324 |
| <b>后 记</b> .....              | 335 |

## 导论 从中国近代批评到现代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中西文化相交汇，古今文化相争斗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但是，确切地说，中西文化的交汇，古今文化的争斗，对于近代文学批评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近代文学批评处于中西文化相交汇，古今文化相争斗的第一时期或曰初始阶段。所以，在近代文学批评中，中国古来的传统已经开始减弱它的无所不在的影响，但却没有完全退出它所占据的领域，甚至仍然很强旺；西方东进的文化标准已经开始产生它的影响，但又没有完全取代中国古来的传统标准而被整个近代文学批评界所接受。概括地讲，近代文学批评亦像近代文化一样，中西文化，古今标准处于对峙状态而非取代状态，处于相互争夺文学解释权的状态而非一方已经失去了优势的倾斜状态。所以，若以龚自珍、魏源作为近代文学批评的起点，龚自珍、魏源则代表着传统的终结，而不能看作是新的文学思想的真正开始。龚自珍、魏源是站在传统之内对传统进行了批判。龚自珍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sup>①</sup> 其“完”字标准的提出，就体现了对于个性的追求。因为，他之“完”要求作家的创作应该充分地体

---

① 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中国历代文论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现自己的性格特点，做到诗如其人，以言立诚。龚自珍在诗文中多次抒写自己对于“童心”的向往，对于庄子、屈原、李白的推崇，都是他以个性论文学这一基本思想的强烈表现。龚自珍萌发的个性思想，是对传统的封建思想压迫的有力反抗。魏源主张“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sup>①</sup> 这强调文学创作要有独创性和敢于背离既成模式的勇气。然而，龚自珍和魏源由于是站在传统的领域之中反叛传统的，复古成了他们开拓传统的必然选择。不能否认这种选择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换句话说，有着近代色彩。不过以传统反传统，终难跳出传统的樊篱。龚自珍和魏源的文学思想，还没有受到多少西方文学思想的直接渗透，故其只是近代文学批评的先声。至黄遵宪、梁启超，才是近代文学批评的真正开始和展开。黄遵宪和梁启超不仅游历了西方诸多国家，而且认识到了“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sup>②</sup>在讨论文学问题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欧洲，从欧洲的文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以确定文学的性质。黄遵宪指出：“余闻罗马古时，仅用拉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黄遵宪得出结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正是以此为鉴，黄遵宪提出了文言合一的观点，主张文字应当“愈趋于简，愈趋于便，”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sup>③</sup>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他亦以西方之标准加以评估：“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

---

① 魏源：《定盦文录叙》，《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② 黄遵宪：《与严又陵书》，《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③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同上。

世界之力。”<sup>①</sup>黄遵宪的文学思想中，已经包含了西方文学的观念，这种异质因素，使其论文学时有了不同于传统的见识，开始把中国文学拉向背离传统的方向。我们很难说这一步迈得有多大，但只要是真正迈出了一步，同样是值得肯定的。梁启超开始较为明确地介绍西方的文学观念。他在讨论小说时，已有“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之区分。他认为：理想派小说能够“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写实派小说则往往描写人们“所经历之境界，”将其中读者想说而不会说，想写而不会写的东西“和盘托出，彻底而发灵之，”令其“拍案叫绝”。梁启超以为“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sup>②</sup>在讨论诗歌时，又有为人生派和为艺术派的区别，并且认为二者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梁启超写道：

诗是歌的笑的好呀，还是哭的叫的好？换一句话说，诗的任务在赞美自然之美呀，抑在呼诉人生之苦？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为做诗而做诗呀，抑或应该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作诗？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痛苦，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sup>③</sup>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中，人们沿用了梁启超的这一思想。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人生派，为艺术派，都与梁启超的这种介绍有关。所以，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学批评中向西方寻求新

---

① 黄遵宪：《与丘菽园书》，《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同上。

③ 梁启超：《情圣杜甫》，《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版。

的思想观念的重要人物,虽然他对西方文学思想的介绍还不系统,但也足以说明近代文学批评走向新的理论天地的趋势,正在强化。近代文学批评正在成长。

王国维对西方文学思想的介绍,已经显得相当深入和成熟。他不仅深受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深受西方近、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他曾经自述:“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意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sup>①</sup>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潜心研究西方思想的人,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具有西方思维方式的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王国维由研究哲学转向研究文学,必然以西方的标准来讨论问题。王国维就接受了康德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用康德的无功利美学观来解释文学的功能,用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和悲观主义来解释文学的内容。所以,王国维虽然也像梁启超那样,以“理想”和“写实”来区分诗歌创作,成为后来论诗歌的研究者区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个依据,他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已经以一个西方的文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来看整个的文学创作,对文学的理解,已经有了一定的统一性。中国的文学研究在王国维这里有了两个变化:一个是纯文学理论初现端倪。在王国维之前,人们论文学总是把文学和文章混为一谈。王国维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我们常说的文学一词的现代涵义,应该从王国维的文学研究算起。一个是王国维的研究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体系性。他对人生的看法和其对艺术

---

<sup>①</sup> 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版。

的看法高度一致。这使他的文学观有了人生观作依据，从统一的人生观来建立统一的文学观。所以，我们感到，王国维的文学观不再是破碎的理论百衲衣，而是整洁的色调统一的理论锦缎。总之，对于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讲，王国维的出现是一个崭新的理论景观，向中国的传统的文学思想里注进了一剂迥异传统的理论血液。应当承认，至王国维，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已经大异龚自珍和魏源的时代，不仅包括着新的西方的文学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已经显示出了它的理论活力，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母腹中成熟了，躁动着，要求着它的生存权。一旦它能跳出束缚它的羁绊，它的理论前景，是十分诱人的。

不过，中国近代的文学批评虽然有了从异域汲取的活力，它仍然没有完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蜕变。因为它与传统的关系还太紧密，所以，它是摆脱传统的一股力量，却不是彻底扬弃传统的一种选择。中国近代文学批评还过多地承受了传统的束缚，不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我们认为，这三方面可以加以总结：

第一，在近代文学批评的视野中，传统的保守的文学批评依然十分活跃。桐城派虽然已经衰落，但经曾国藩的扶持和领导，又有了桐城派的“中兴”。曾国藩论文学虽然对桐城派的缺点有所匡救，但其并未背离桐城派恪守传统的守旧倾向。曾国藩说过：“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认为诗文创作也应受乎礼义的制约。“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于此二途（指仁义，引者注），虽百世可知也。”<sup>①</sup>这样，文学依然被束缚在表现孔孟仁义的范围内。曾国藩死后，其弟子亦未放弃这种主张，仍然在近代文学批评的疆界中进行活动。如吴汝伦，虽然也承认介绍西方学术的必要性，但对桐城派的基本思想还是坚守而丝毫没有松动的。吴汝伦认为：“西

---

①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6月版。

学行，则学人目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他认为废弃姚选古文，就是废弃中国传统学术，“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尤而大恐者也。”<sup>①</sup>此外，还有宋诗派，同光体派的相继活动，以宋诗并上及唐诗为创作的最高追求。这种追求对凋敝的清代文坛有某种针砭作用。但这种针砭不是把他们引向对未来的思考，而是促使他们掉头向往古代；在唐诗宋诗中寻找出路，必然毫无贡献。我们认为，看近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背景，传统的氛围不是一般的浓厚，而是浓重得化不开，推不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要想依靠初次涉猎西学的人们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切合实际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近代文学批评只能表现出它与传统所划出的某些界限，却很难表现出它与传统的截然分离。

第二，在近代文学批评中，代表西化的批评主体自身，与传统的联系过于密切。他们的思想虽然有了西化的印痕，近代的色彩，但传统的思维模式没有被击碎。传统的思维模式还像一块灵敏度很高的触板，可以吸附新的信息，将其化解成符合传统的思想资料而被接受。这结果，进化论成了中国古代的公羊三世说，民主人权的思想成了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乌托邦成了大同说和天下为公说。论文时这种现象也相当突出。在讨论《水浒》时，就出现了这种观点，认为《水浒》中描写了官逼民反，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对民约论的发挥，“民权之思想”获得了表现，所以，施耐庵“可比卢梭”。《水浒》描写了诸多英雄的“英风动山岳，高义薄云天”，这宣扬了中国的武士道精神，是对“尚侠之思想”的认可，施耐庵“可比西乡隆盛”。还认为“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之巾帼，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对

---

① 吴汝伦：《答严几道》，《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妇女的重视使施耐庵“可比达尔文”。<sup>①</sup>这种简单的比附，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还没有跳出传统的樊篱，还没有抛弃天朝式的中心意识。以翻译《天演论》而闻名中国思想界的严复，虽主张尊民叛君，尊今叛古，他对近代的文界革命还不完全赞同的。在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时，他对雅的规定，就体现了相当保守的思想色彩。他认为：“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期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钧奇哉？不佞此译，颇貽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sup>②</sup>按照这种理解，就是说汉以前的古文更适合于翻译《天演论》，而近代流行的白话文则不适合于这种翻译了。在严复的思想中，还是古文好，只有古文才利于表现思想情感，创造出不朽作品。严复被保守的吴汝伦引为同道者，就说明他在近代批评界扮演的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复杂角色。以严复对西方的了解，还不能斩断他与传统之间的坚固羁绊，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近代文学批评的主体还没有自觉到要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觉醒程度，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带着传统来接受近代化，使近代化具有传统的意味，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使近代化成了传统化的一种蜕变过程。所以，近代批评的主体，还不是一个具有充分的历史主动性的批评主体，依靠他们，还不能真正进入文学的现代化过程。

第三，近代文学批评还缺少恰当的研究对象。如梁启超的

---

① 佚名：《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② 严复：《译天演论例言》，《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

《饮冰室诗话》，以同代同党的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为研究对象，盛赞他们诗作的艺术成就。但近代文学并未产生公认的经典作品，足以蔚然成为一代文学景观。所以，近代文学批评在汲取西方的文学观念作为批评标准讨论文学中的某些根本问题时，主要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学作为对象的，用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说明中国文学中的固有问题。在梁启超论述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时，谈的就是古代的名著，有所谓“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sup>①</sup>此外，梁启超还以《西厢记》、《花月痕》、《野叟曝言》作为例证说明小说对人的特殊影响力。王国维对诗歌意境的研究最为著名。在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时，他有造境与写境、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之分，但他只能用以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学，把曹雪芹视作客观诗人之代表，李后主视作主观诗人之代表。应当说王国维在这里讨论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是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的，因为他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把握是准确的，揭示了文学规律。但是，王国维只能以传统的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传统文学所涵蕴的规律，这不能不限制了人们对这一规律的普遍性的认识，所以对文学创作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也不大。在王国维的思想中，还没有别创一种新文学的观念在。我们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犹如一鸟双翼，需要共存，需要平衡。在文学创作还未成熟的时候，代表这一文学创作精神的文学批评也难成熟；反之，在人们对某种文学的认识还未成熟的时候，这种文学也难应运而生。近代文学的不成熟，与近代文学批评的不成熟是相为因果的。

但是，近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又是不应低估的。它所包括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对五四文学革命

---

<sup>①</sup>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的到来，产生过很大的召唤作用，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准备过必要的条件。有四点值得注意：

其一，由文言合一而产生的白话文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在龚自珍时就已分析了言文不一这种现象：“古之世，语言出于一，以古语古，犹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后之世，语言出于二，以后语古，犹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虽有大人生于霸世，号令弗与共，福禄弗与偕，观其语言，弗可用；号令与共，福禄与偕，观其语言，卒弗可用；于是退而立大人之语言，明各家之统，慕圣人之文，固犹将生越而言楚也。”<sup>①</sup>至黄遵宪，不仅把言文合一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知识的必要前提之一，主张用俗语，造新字，而且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口号，并进行了有力的实践。裘廷梁则公开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他认为言文的不合一，“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这已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仅危害了学习文字的人们，也危害了善于运用文字的人们：“呜呼！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皆受之矣；不宁惟是，愈工于文言者，其受困愈甚。”所以，他从“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的标准出发，揭示了废除文言推行白话的重大意义：“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sup>②</sup>裘廷梁把白话看作维新能否成功的根本，虽难免立论不太稳妥的毛病，但把白话

---

①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三》，《龚自珍全集类编》，中国书店，1991年6月版。

②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抬到这样的高度，则给刚刚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对于促成中国近代文学尽快地向着新的语言形式方向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从进化论的角度，说明了俗语文学出现的必然性：“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指出宋元以来中国俗语文学的发展，不是中国文学的退化，而是中国文学的进化。因此，梁启超认为：虽然俗语文体受到了考据学的侵害，“语言文字相去愈远”，很难一时改变这种面貌，但是，“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sup>①</sup>由梁启超的言论可知，进行一场非文言的俗语文学运动，已经是近代文学批评中有识之士的远见卓识，只是这一运动刚刚起步，故其不可能立即取得成功。但是这却启示了后来人，把这一运动接续下去，去开辟新的文学前景。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发动的白话文运动，就是近代文学批评中对于白话文高度重视的结果。我们认为，没有近代的一批先见者为白话文所做的宣传、研究，决不会有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也不会有中国现代的白话文学的正式确立。

其二，近代文学批评提高了小说、戏剧的社会地位，这为文学更好地表现人生，提供了更切合的方式和手段。小说和戏剧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无宁说是不被重视的，不如说是受排挤的。近代批评家坚决纠正了这一偏向。严复、夏曾佑就认为小说对于人心之影响，流传之恒久，“几几出于经史上”。所以，他们从“人心”决定了“人身”，“今日人心”就是“他日人身”的认识出发，指出了“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严复和夏曾佑提请人们注意，

---

① 梁启超：《小说丛话》，《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3月版。

不能因为小说出于虚构就轻视它。<sup>①</sup>梁启超则批评了中国人对于小说的忽视，认为中国人思想的形成，与小说的影响很有关系。他说：“盖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言英雄则《三国》《水浒》《说唐》《征西》，言誓理则《封神》《西游》，言情绪则《红楼》《西厢》自余无量数之长章短帙，燮然杂陈，而各皆分占势力之一部分。”因此，他认为“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sup>②</sup>已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所以，梁启超成为一个特别重视小说的近代批评家，他的一系列小说研究的文章，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论点而展开的。狄葆贤接受了梁启超的这种思想。以为“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家之地位，顾可等闲视哉！”他进而作了发挥，认为中国文学界得一百个司马迁、班固，不如得一个施耐庵、金圣叹，得一百个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个汤显祖、孔云亭。狄葆贤知道他的言论有些不尽合理的地方，但他坚持这样立论，则表明了他对小说一往情深，高度重视，认为不发展小说，就不足以发展中国的近代文学。出于这样的考虑，使得狄葆贤不得不冒着立论不稳的危险，去对小说大唱赞歌。“吾言虽过，吾愿无尽。”<sup>③</sup>狄葆贤这样写时，不能看作是惊人耳目的哗众取宠，而应看作是近代文学批评家为了为小说争地位，敢于向传统的文学观念挑战，这代表着近代文学批评的进步。戏剧的命运在近代同样发生了变化。陈去病认为不能轻视戏剧。他从古乐与古代戏剧的关系来看戏剧的有益和作用：“抑子宁薄俳優而笑之耶？则吾且与子道古。仲尼曰：‘移风易俗，莫善乎乐。’孟轲氏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彼戏剧虽略殊，顾亦未可谓非古乐

---

① 见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② 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③ 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同上。

之余也。”陈去病以古人对于古乐和戏剧的欣赏为例说明戏剧的移情感人作用：“是故知礼如魏文侯，而不能对古乐免于思卧；好贤若渴之楚庄王，且必待优孟而始动于其心：则今乐之移人，洵速且捷哉！”<sup>①</sup>三爱有相近的看法，也认为“戏曲原与古乐相通者也。”因此，他也反对轻视戏剧的传统见解：“我中国以演戏为贱业，不许与常人平等，泰西各国则反是，以优伶与文人学士同等，盖以为演戏事，与一国之风俗教化极有关系，决非可以等闲而轻视优伶也。”三爱称：“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教师也。”<sup>②</sup>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里亦将戏剧的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加以认识，认为戏剧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广泛的普及性，可以正确地加以利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所以，他和同人发起改良戏剧的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运用戏剧这一种方式达到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至近代，人们也像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一样，极大地抬高了戏剧的社会地位，出现了传统社会中不可能出现的新论：“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sup>③</sup>把社会改良的重任推给戏剧，本来未必是戏剧的福音，因为戏剧如若担负了它无法担负的重任，就不可能完美地发展戏剧本身。但是，近代批评家把戏剧的地位抬高了，也就把戏剧从传统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了，这就使戏剧有了充分发展自己的可能性和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起码条件。小说和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除了现代作家的不倦追求是他们成功的必要条件外，与近代文学批评为小说和戏剧争取社会地位，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三，近代批评坚决批判了脱离现实的文学创作现象，强调

---

① 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中国历代文论选》（四）。

② 三爱：《论戏曲》，同上。

③ 佚名：《观戏记》，同上。